

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

□ 吕锡琛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认识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是人类探索自然的科学活动中所必需的精神气质,不少学者否认中国古代有科学精神,将其视为西方的专利。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以下试以中医学为例略作剖析。

愚意以为,中西方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and 科学规范,中医与西医在基础理论、思维方式、学术术语等方面大相径庭,较为典型地代表了各自所处的文化母土及其特征,但如果以西医为标准而指责中医不科学甚至伪科学,这是有失偏颇的。

科学是一种认识自然、探索、追求真理的活动,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在医疗保健领域内追求真理的结晶,如果超越具体的学科内容,从哲学层面来俯瞰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中华医学中同样闪烁着科学精神的光芒。

科学精神主要包括理性精神、实证精神和探索、怀疑、求真等精神气质。《内经》是中医学理论的开山之作,且被后世医家奉为主臬,书中就贯穿了理性精神、实证精神和探索、求真精神。作者将“气”视为世界的本原和构成万物的始基元素,《素问》的《宝命全形》《五常政大论》等篇中说:“天地合气,别为九野,分为四时,月有大小,日有短长,万物并至,不可胜量”;“气始而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其致一也”;“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万物和人类的生长、四时的转换,皆为“气”之变化,这就深刻地揭示了物质世界的多样统一性。

作者在大量的实际观察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基础上,认识到万物变化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书中将其概括为“阴”和“阳”。《素问》中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万事万物最终可分为阴阳二类,阴阳之气随着春夏秋冬交替变换,发生上下升降的交感而支配着万事

万物的变化。疾病的康复必须顺应客观规律,人不能妄而代之;四时气节的转换,人亦不能违反,正所谓“化不可代,时不可违”“必养必和,待其来复”(《素问·五常政大论》)。作者在《素问》的《天元纪》《阴阳应象》《四气调神》以及《灵枢·终始》等多篇中都反复强调了无视规律、肆意妄为的恶果:“敬之者昌,慢之者亡,无道行私,必得天殃”;“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可以说,这种尊重规律的理性精神是《内经》的理论基石。

可贵的是,作者既认识到自然规律不可违逆,又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可以认识和掌握规律。《素问·天元纪》说:“至数之机,追迹以微,其来可见,其往可追。”在作者看来,规律是事物之中的纲要,具有普遍性,如能认识和掌握规律,就能透过变化多端的事物,触类旁通,以小知大,以少知多,见微知著,探究无限多样的世界:“宣明大道,通于无穷,究于无极也。”(《素问·气交变》)这种认识和掌握规律的信心贯穿全书,彰显出作者对于世界的统一性、简化性的坚信以及试图通过简化方式来统御世界的企图,而这也正是爱因斯坦所推崇的科学家进行探索活动的“积极的动机”。我们看到,正是在这种理性精神和探索精神的指引下,《内经》的作者努力探索人体生命的奥秘和治疗疾病的规律,为后世留下了这一历经数千年沧桑而不朽的千古奇书。

“究于无极”等理性精神引领作者与鬼神迷信划清了界限。《素问》中“道无鬼神,独来独往”“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等话语,都透露出作者不为鬼神所惑的理性态度。书中所说的“神”是指自然界的变化及其奇妙的作用。《素问·天元纪》说:“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这就是说,阴阳的对立统一和相互作用是世界上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动因,而“神明”就寓于其中。这里所

说的“神明”,是指阴阳二气运动并相互作用而化生万物的神奇功能,以此来说明世界运动变化的动因和源泉,从而排除了神灵主宰世界的可能性。

《内经》不仅饱含深刻的哲理,而且从临床实践中总结提升总结出诸多治病救人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因此,它既不是一味地空谈哲理,又避免了仅从自然科学的观念出发而“见物不见人”,将人文精神排除于外的弊端。作为以人为研究对象,《内经》的实证精神、探索精神体现为对患者“审证求因”的深切人文关怀。

作者从天地自然和社会、人生及其相互联系这样的巨系统来考察疾病,从内外多个方面探求致病原因。致病的外因包括:自然界的风、寒、热、湿、燥、火等六种气太过或不及或非其时而生的情况(“六淫”),人的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志过度(“七情”)以及人的饮食不慎、过度劳伤等,疾病与季节、地理条件亦存在特殊的联系。同时,作者又注意到人的主观差异与疾病的联系。由于不同个体各自的差异,即使处于相似的外部环境,人的健康状况和疾病的外质、轻重又各不相同。

面对人体这一如此复杂的子系统,作者十分慎重,《素问·五常政大论》中告诫说,治病必须懂得天道和地理,阴阳的相胜,气候的先后,人的寿夭,生化的时间,然后才可知道人体内外形气的病变。因此,仅依赖一种诊法不能准确反映疾病的本来面目,必须通过更多诊法全面地获取资料:“上取于天,内取于外,以求其过。”即对患者机体的上下表里进行仔细检查,相互对照比较,以求其不正常的症状,才能作出正确诊断。还需要要了解疾病的来龙去脉,调查患者的生活环境、人生境遇以及与之相关的情绪变化,全面、细致地掌握病情及其变化。面对千差万别的个体,不仅要给予及时、对症的治疗,更要“同病异治”。可谓探微索隐,体贴入微。

在历代医家的实践活动中亦洋溢着实证精神和探索求真的科学精神。晋代兼高道、医家于一身的葛洪等人就是典型代表。葛洪在医学、药理学等领域卓有建树。他从实践中收集大量救急方并筛选而撰成《肘后备急方》这一极为实用的医学常备急救书籍,观察和记载了结核病、狂犬病等疾病的原因、症状,还发明以疯狗之脑敷病人伤口的方法,堪称免疫学的先驱。葛洪在世界医学历史上第一次记载了天花等传染病,还记载了松节油治疗关节炎、铜膏(碳酸铜)治疗皮肤病,雄黄、艾叶可消毒等。他提出“水渍青蒿,绞汁尽服”以抗疟疾的方剂更是穿越时空,拯救了古今中外无数芸芸众生,成为当代中国人获取诺贝尔奖的智慧源泉。

中医学一方面继承前贤,同时又又在不断怀疑和创新中前进,怀疑创新正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容。例如,元代医家朱震亨就提出了“燥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的观点。他在实践中认识到当时通行的宋代所制定《合剂局方》之不足,为了弥补其缺陷,解决医疗实践中的疑难问题,他“渡浙河,走吴中,出金陵,抵南徐,达建业”,寻访名师,进而将刘完素、张从正、李杲等医家的医理加以运用和完善,博采众家之长,宗古而不泥古,创立新说,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等学术观点,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开创了内伤杂病治疗的新局面,与刘、张、李三人同列为金元四大家。

同样,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亦是质疑古代医书中存在的谬误,从而发愤去谬求真,以毕生精力,亲历实践,广收博采,对本草学进行全面的整理总结,撰著出《本草纲目》这一闻名世界之药理学巨著。

在历代医家中,清代名医王清任身上彰显出的科学精神更是令人瞩目。他有感于“医道无人”的重要原因在于不

明脏腑,“因前人创著医书,脏腑错误;后人遵行立论,病本先失”,从而导致“病情与脏腑绝不相符”的弊病(王清任《医林改错》自序)。为了寻求真理,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突破封建礼教,亲临坟场、刑场翻查遗骸,细致求证,修改被奉为医学圣典的《黄帝内经》中关于人体解剖的自相矛盾之处,重新绘制人体解剖图谱25幅,总结60种气虚证、50种血虚证、33个治痰方,并形成了活血化瘀法临床应用完整体系。为了弄清人体的隔膜位置,他甚至留心40年之久,最后得闻于屠夫之口,才将历时42年的《医林改错》刊行。这种勇于实践的实证精神,尊古而不泥古的怀疑、改错精神,不耻下问、40年磨一剑的严谨态度,实在令人肃然起敬!王清任虽未理解中医的脏腑是功能系统性的五行,而并非完全是实质的脏腑,故书中存在一些错误,甚至被人讥为“越改越错”。但他在中医解剖学、方剂学、内科学上的贡献仍为不少医家肯定,特别是他的探索、怀疑、求真、实证精神,更是集中地展现了中医先贤的科学精神,值得后人推崇和学习!

中医学传统中蕴含的理性精神、实证精神和探索、怀疑、求真等精神气质不仅与西方的科学精神相通,而且,其所特有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更注重自然与人的协调统一、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结合。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态势下,努力发挥中医学的优长并将其与现代科学特别是与现代医学进行互补与整合,建立融中西医学思想于一体的21世纪新医学,正在成为不少有志之士的共识。要完成这一宏愿,需要从哲学的层面搭建融通中西的桥梁。因此,发掘和弘扬中医先贤的科学精神,有助于接引、融合中西方科学精神,又可能防止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的偏颇;不仅能为当代医学工作者提供综合创新的启示,更可为广大科学工作者提供探索真理的精神动力,让科学更好地造福于人类。(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哲学系)

秦汉新道家与黄老之学

□ 熊铁基

20世纪70年代末我研究《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提出了“秦汉新道家”的概念。1981年在《文史哲》第2期刊物上发表题为“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新道家”的文章,1984年又集结有关论文出版《秦汉新道家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虽然“秦汉新道家”这一提法曾经受到学界广泛的注意,但明确赞同和使用这个提法的人不多。而同时引起的一个研究就是黄老之学的研究,先后有吴光的《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丁明明的《黄老学论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著作出过,此二书皆从战国黄老之学讲起,包括秦汉“黄老道家”。而研究战国“黄老新学”的更多,如胡家聪的《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白契的《稷下学研究》(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台湾陈丽桂的《战国时期的黄老思想》(台北联经出版社1991年出版)等早一些,她在研究黄老思想时是注意了

《秦汉新道家论稿》的。我所说的“秦汉新道家”与“黄老”关系十分明确,黄老道家也是我提到过或想到过的。

“黄老”一词,在文献上有根有据,众所周知《史记》中就有:申不害之学“本于黄老”,韩非也“归本于黄老”,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皆“学黄老道德”之学,因发明、序其旨意”。还有盖公“善治黄老言”、陈平“本好黄帝、老子之术”等几十处“黄老”连称(参见《史记》有关列传、世家)。不论是说“黄老之言”,还是称“黄老之术”,或被称为“黄老之学”,实际上都是讲的道家思想,是以《老子》为清静、无为为核心的道家思想,突出的是在老子之前加了一个黄帝。

随着黄帝传说越来越多,从战国中后期开始,黄帝的书也就纷纷出现了,《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有二十七种冠以黄帝君、臣名的书籍:道家类五种,兵阴阳五种,五行类三种,神仙类四种,医经、经方各二种,天文、历谱、杂占、房中、阴阳、小说家类各一种。不难看出,

这些黄帝书基本上可以归入“杂而多端”的道家,主要是道家人物创作的,而且如《黄帝君臣》十篇注所说:“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是战国时期的人根据《老子》之本思想而创作出来的。实际上当然不只以上二十七种,近些年出土的简帛材料中,有不少被认为是属于黄老思想的文献,黄老之学的内容就大大丰富了。毋庸置疑,黄老之学是道家之学,是战国秦汉之际的道家之学,以《老子》思想为核心的道家,创造和包含了黄帝的各种思想和学问,这是道家发展和包容性的一次突出表现。

道家抬高黄帝,创造黄帝书,应该是在与儒家争鸣中产生的。儒家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这是当时很明显的事实,道家抬高黄帝来,比尧舜更早,可以增强自己的争鸣资本,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托词于黄帝建立自己的学说,以便更有竞争力。

西汉初年,当权者(张良、陈平、曹参、

文帝、窦太后等一批人)信黄老之言,行黄老之术,黄老之学大显,于是到汉武帝时出现了黄老道论的集大成著作《淮南子》。

由此看来,“黄老学”或“黄老新学”乃至“黄老道家”等等,当然会被使用。道家有极大的包容性,因而它不断发展,有很明显的发展性。汉初极盛的黄老道家(或称道家的黄老派),与以前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称之为“秦汉新道家”。“新”,就是讲的发展,道家思想不断发展,所以会有不只一次的“新”。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曾把魏晋时期的“玄学”称为“新道家”,他说:“‘新道家’是一个新名词,指的是公元三、四世纪的‘玄学’。……‘玄学’这个名称表明它是道家的继续。”(《中国哲学简史》第253页)这是他对道家流派的阶段划分提出的。我看或者称“魏晋新道家”更为合适。按历史阶段划分,以后还可以有“唐宋新道家”。这些“新”,既有历史阶段的划分之意,包含着发展之意,也有内容上的“创新”之意。道家是在不断创新中发展的。

以《老子》思想学说为根本的“道家”(“其要归本于老子”),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些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出现过许多不同的派别,研究者会使用一些不同的称谓,如按地区分有楚道家、齐道

家、郑道家、秦道家等等;按时间分有先秦道家、战国道家、原始道家等等;还有老庄派、黄老派等分法。按历史阶段分有先秦、秦汉、魏晋、唐宋,无疑是几个区别明显的大阶段。各阶段有各阶段的特点,而且是一些特别突出的特点。先秦以老庄为代表,可以说有其原始性。战国秦汉,就是如上所述有黄老特色,当时创造了许许多多《老子》思想为核心的黄帝书,是《老子》思想的发展和丰富。魏晋可以用“玄学”命名的“新道家”,其突出特点应该是吸收了儒家思想,是汉代以来“儒道互补”的结果,或者说以道家为基础吸收和融合儒家思想的结果,玄学的主题之一“自然与名教”,“自然是道家的,‘名教’是儒家的,玄学家们是站在道家的立场,讨论儒家的‘名教’思想。然后,就是唐宋以后,道家(包含道教)的‘新’,我看应该就是‘三教合一’、道家、道教的‘三教合一’,也是以自己‘道’的立场为主的。”

由此可见,用“秦汉新道家”、“魏晋新道家”以及唐宋以后的“新道家”(乃至当代新道家)来形容和说明道家的发展,比起“黄老之学”“玄学”等更有系统性。既能明确说明道家的发展性,也可以反映道家的包容性,“新”就新在道家对其他学派、思想的吸收、融合和包容。

“秦汉新道家”比“黄老之学”似乎能更明确地反映道家的发展。

关学思想史·小识

□ 刘学智

关学自张载立宗开派,迄清末殆八百余年。张载以千古道学之勇,“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唯建立孟子以来宋学‘未有也’之宏大思想体系,且以‘学古力行,笃志好礼’,成为一代‘关中士人宗师’。当时‘关学之盛,不下洛学”,蓝田诸吕,武功苏季明,三水范霁之、张芸叟,长安李涵水,武功游师雄等,并立张载门下,接续横渠遗风。然张载歿于临潼,哲人其萎,关学衰微。诸吕、范、苏等,转入程门,唯为传道受业,少有门户之见。虽有与叔守横渠说“甚固”,然因其“再传何其寥寥”,终不逮程朱之学显达。

应。关中学者,始由宗横渠而宗关阙濂洛,关学与程朱理学相融并立,复得振兴。元末奉元之学稍盛,萧氏维斗、周氏渠愚,“闾关、洛宗旨”,既驾程朱主敬穷理,复尚张载礼教躬行。“元儒笃实,不甚近名”,此体现于关学学人,尤为鲜明。

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其学多衍伊、洛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明代关中之学,“大抵源出河东、三原”。河东薛理之学,经关院段容思、周小泉而传薛敬之、吕泾野,其学恪守程朱,一时称盛。而泾野集诸儒之大成而直接横渠之传,尤为独特。王恕、王承裕父子开三原之学,宗程朱以易为阶梯,祖孔、颜以为标准,摭心得,自成一派,故有关学“别派”之

称。继有马駉田、韩苑洛、杨斛山、王秦关者,虽学归程朱,而亦尚横渠。駉田“得关、洛真传”,虽“论学归程于朱”,然执礼则诚“如横渠”。苑洛以《易》为宗,论道体乃“独取横渠”。斛山以苑洛、駉田为师,绎四子诸经百家,精研于《易》。秦关笃信好学,尚友千古,立身约,为会讲,蓝田民俗之复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而不迂异说者,无复几人。明代学术分途,自献章、守仁而后。然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姚江之学,别立宗旨,影响深远。渭南南元善为官绍兴,服膺文成,刊刻《传习录》,后持心学以归,与弟姜泉讲学蒲西,不遗余力,是为关中有关王学之始。心学大学之时,其流弊亦愈滋甚。关中“东冯西张”,

双峙并起,力戒浮虚。少墟讲学,既宗程朱,“使关阙学暗而复明”,亦服膺“良知”,与南皋、景逸鼎足相映。闾本休工夫合一之指,严儒佛心性同异之辨,其思想“盖统程朱陆王而一之”,遂集明季关学之大成。张舜典“明德”“致曲”,“洞源达本”,一改晚明重本体轻工夫之风。

明清鼎革,“天崩地解”,学术为天下降。朱、陆、薛、王之辨,纷然盈庭。时有被誉为“关学后镇”的周至李二曲,本于姚江“致良知”而不悖,会通朱陆薛王而不遗。以“悔过自新”为入德之门,以“明体适用”为学问依归。其嫡传王丰川“继横渠道统,承二曲心学”,力排门户之见,合朱、王之学而一之。同时之王复斋,于二曲倡心学之时,即以“真隐高蹈”重关学程朱一路,“以主敬学诚为功,穷理守道为务”,其学之醇细,或谓“在二曲之上”。又有太白雪山,寄情山林,卓然一家,既以生命体验颜之乐,更游心于儒,既以道之真,其特立独行,超然拔世。朝邑李桐阁,博大刚毅,心慕河

文清,学宗关阙濂洛。其嫡传贺清麓承继师风,以程朱为孔孟嫡传,故“惟程朱是守”;以陆王背孔孟之旨,力加辟之;承横渠宗风,重躬行实践,不失关学本色。蓝田牛蓝川秉明师说,“远接紫阳之绪,近恢清麓之传”,其学与桐阁、清麓一脉相承。惜时世聚变,虽知其不可而为之,恪守诸儒之说而不变,续道统于不绝,为传统关学最后守护者。而通经致用者,有三原刘古愚、长安柏子俊、古愚之学“导源姚江,汇通濂洛”,本于良知,归于经世,尤能穷经以致用,故“百日维新”,有“南康北刘”之誉。子俊与古愚志同而道合,讲学于关中、泾干,弘道于味经、洋西。讲理学,接西学,通经史,办实事,设“求友斋”,置“时务斋”,联络同志,以济时艰,为关学转型之旗帜。其所著刻之《关学编》,一以少墟原编为例,整合补缀,终成关学之全编。其《前序》揭关学史之演变,《后序》显“关学编”之流行,破除门户之见,揭橥关学本源。阳明谓“关中自古多豪杰”,诚哉斯言!

第四届国际

尚书

学术研讨会

综述

由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国际《尚书》学会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国际《尚书》学术研讨会”日前在香港浸会大学隆重召开。来自海内外的《尚书》研究者60余人,齐聚香江之畔,商榷千年绝学,阐扬贤圣心传。

《尚书》作为中国政书之祖,史书之源,是中国一系列政统秩序和道统理念的滥觞与渊薮。民族文化的复兴,自然离不开《尚书》,也绕不过《尚书》。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弘扬国学正脉,承继传统文化”。与会学者提交大会论文65篇,研究内容包括《尚书》学与史学、文学、经学、训诂学、语言学、文化学等多个领域,既反映出《尚书》学研究的新进展新路径,又反映出发掘经典国学新价值的时代诉求。

会议的两场主题演讲阶段,夏威夷大学中英教授从中西视野对比的角度对《尧典》的德权政治模式展开了深入讨论,创造性地揭示出传统文化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高岛谦一教授、香港大学单周尧教授、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傅永聚教授各自以《“大诰”尹氏及有关问题》《“尚书”与甲骨文的情态动词》“校释和今译”“人才标准观”等研究视野对《尚书》做了专题分析,引发与会学者的积极提问和热烈讨论。会议的15场分组讨论阶段,澳门大学郑国光先生勾勒沉潜港澳《尚书》阐释中的人道精神,拓展了经学研究的视野。俄罗斯学者马约罗夫教授就俄文版《尚书》的翻译以及《尚书》学在俄罗斯传播、日本中央大学水上雅晴教授就“日本号资料中的《尚书》学”、扬州大学朱岩教授就“朝鲜实学《尚书》学”等《尚书》学域外研究课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展示出中国古老文明的强大张力。北京大学张允起先生疏解了《洪范》对中国政治哲学深层结构的影响,对如何正确理解中国的政统有着积极意义。贵州大学张连顺先生对商周之际宗教哲学的演变考察,是佛教学术与经学研究融合的积极探索,反映出现代学术交叉融合的趋势。

两天的会议,中外学者诵述《书》义,摩研笈传,体现出当代知识分子对传统学术的执着和忠诚,也体现出“寥寥三千年,气象挽可回”的复兴之愿。正如国际《尚书》学会会长钱宗武教授在闭幕式上所总结的那样:经学历尽劫波,传统生生不息,我们心中不灭的民族文化遗产之火必然燎原,《大禹谟》所谓“德延”十六字诀,曾经构建起宋明理学庞大的学术体系,今天“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仍然是我们致敬传统、坚守道德、潜心理学和复兴文化的强大武器。(卢鸣东)

《孔子研究》创刊30周年

中国孔子基金会“十三五”学术规划研讨暨《孔子研究》创刊30周年纪念座谈会近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儒学发展与中华文化复兴。

《孔子研究》创刊于1986年,时任名誉会长谷牧先生亲自撰写发刊词。该刊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是专门反映孔子、儒学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最新重要研究成果及学术动态的国际性中文学术期刊。30年来始终秉持“学术天下之公器”的理念,坚守学术办刊的定位,以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作为取舍稿件的唯一标准,讲求兼容并蓄、择善而从。截至今年第二期,《孔子研究》已出版154期,刊载学术论文2346篇,总计达到了2211多万字,可谓中国30年儒学学术发展的见证者、践行者、引领者。

与会专家学者对《孔子研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孔子研究》经过30年的发展,以“引领儒学复兴”为使命,无论题材选择,发稿标准还是编排质量等方面,都是名副其实的一流学术刊物,代表着学术的良知与高度,是儒学文化研究成果的重要展示平台,已成为全国儒学研究的一面旗帜。此次会议还公布了《孔子研究》创刊30周年“特别贡献奖”与“优秀论文奖”。

(张欣怡)